

# 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 进行的合理性辩护

傅小凡

**摘要:** 朱熹在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同时,着手重建家族制度。为了完成这一社会实践任务,朱熹从三个方面对重建家族进行了合理性辩护:其一,从天人一体的本体论高度,论证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的合理性;其二,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,要求每个家庭成员以事天的虔诚与恭敬孝敬家长,从而为家族建设提供情感依据;其三,从生死观的角度讨论孝亲的合理性,以及重建家族制度对于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的终极意义。

**关键词:** 朱熹; 理学; 家族制度; 重建; 合理性辩护

**中图分类号:** B244.7

**文献标识码:** A

**文章编号:** 1008-1569(2014)01-0111-06

宋代理学代表人物朱熹,在对宋代理学进行集大成式地概括与总结的过程中,努力重建家族制度,一方面,使形上的理学走向现实,与民众的生活方式密切结合;另一方面,使理学获得长久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。这是中国历史上,运用哲学观念改造社会基层组织成功范例。重建家族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,首先要在理论上进行合理性辩护,建构家族制度重建的理论基础。这些基础理论是理学家对家族制度的基本理解,也是理学家通过重建家族制度要世代传承、发扬光大的儒家最基本的政治、伦理观念。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而进行的本体论意义的辩护,主要通过其《西铭解》表达出来。《西铭解》是朱熹对张载《西铭》一文所做的全面而详细的解释。张载是宋代最早提出重建家族制度的理学家之一,他在《西铭》一文中,为重建家族制度进行了合理性辩护和本体意义的论证。朱熹通过《西铭解》,不仅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理学观点,而且在张载的基础上,丰富和完善了重建家族的基本理论。《西铭解》大约成书于乾道六年至八年(1170-1172)之间,直至淳熙十五年(1188)才对学者们公开。可见,朱熹对此书的撰述与发表十分慎重。<sup>①</sup>朱熹对家族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和论述,使其理学思想与社会现实更加贴近,这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,努力沟通形上与形下之间关系,建立基本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直接联系的重要举措。使得理学不再是空谈心性的枯燥的理论,而是改造社会基层组织,直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法。

## 一、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

张载的“乾称父,坤称母,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”一语,以宏大的视角,将天地与人之间的

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“宋代理学与家族制度重建”(项目编号:09YJA720019)。

作者简介:傅小凡,哲学博士,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MBA 中心教授,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关系,定位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。朱熹解释道:

天,阳也,以至健而位乎上,父道也;地,阴也,以至顺而位乎下,母道也。人禀气于天,赋形于地,以藐然之身,混合无间而位乎中,子道也。然不曰“天地”而曰“乾坤”者,天地其形体也,乾坤其性情也。乾者,健而无息之谓,万物之所资以始者也;坤者,顺而有常之谓,万物之所资以生者也。是乃天地之所以为天地,而父母乎万物者,故指而言之。<sup>②</sup>

朱熹将这段话隐含的意思完全挑明了,或者赋予了自己的理解。这段解释有几个关键之处:首先,朱熹强调天在上、地在下,地位不同,为人间的等级制度提供合理性辩护;其次,将“予”明确解释为“人”或者所有人,而不是仅仅是“我”,并且指出这“予”就是天父地母的儿子。“混然中处”的本义可以理解为人类在外形上虽然渺小,但是,却顶天立地于天地之间。可是,朱熹却将“中处”解释为“子道”,形象地描述儿子在家族中的地位;第三,“天地”与“乾坤”的区别,本来是易学中“取象说”与“取义说”的不同观点,而理学正是“取义说”的赞同者。朱熹以理学的心性理论为依据,将“乾坤”理解为天地的性情,而这种性情以永不止息的方式,起始和资生万物。最后,“乾坤”成为天地之所以为天地的本体依据,并且将“父母”一语活用为动词,成为乾坤创造和主宰万物的力量。此时,“乾坤”显然就是朱熹心目中的“天理”。

张载接着说“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”这句话字面的意思可以理解为:天地间的物质,组成我们的肉体;天地之间的主宰,构成我们的本性。可是朱熹却解释说:

乾阳坤阴,此天地之气,塞乎两间,而人物之所资以为体者也。故曰“天地之塞,吾其体”。乾健坤顺,此天地之志,为气之帅,而人物之所得以为性者也。故曰“天地之帅,吾其性”。深察乎此,则父乾母坤,混然中处之实可见矣。<sup>③</sup>

朱熹显然用自己的理学观改造了张载的思想,将“塞”解释为阴阳之气,它构成人的肉体;将“帅”解释为刚健与柔顺的品质,它们是阴阳之气的主宰,因此是人的本性或者人生命的主宰。只有在深刻体会阴阳、健顺之道理的基础上,才能把握“混然中处”也就是人的价值、人性的确切意义、或者做人的道理。这样的改造虽然离开了张载的本意,却使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进行理论辩护的意思更加明显。

张载从“混然中处”的人在天地间的地位,进一步得出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”这种万民平等、天人合一的结论。天地人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大家庭,人在天地自然间生存,好比在一个大家族里生存。天地是人类的父母,大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。对此朱熹解释说:

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,其所资以为体者,皆天地之塞;其所得以为性者,皆天地之帅也。然体有偏正之殊,故其于性也,不无明暗之异。惟人也,得其形气之正,是以其心最灵,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,体于并生之中,又为同类而最贵焉,故曰“同胞”。则其视之也,皆如己之兄弟矣。

意思是,人与物共同产生于天地之间,其构成形体的材料和决定其存在的道理是一样的。但是,由于构成其形体的材料有偏正也就是质量的不同,因此人与物禀赋的天理也就有了明暗的区别。人禀赋天地间的正气,因此有了心灵世界,从而可以理解和把握自己的性和命。因此,人在万物中最尊贵。张载的“民胞物与”思想,强调的是我与同胞,人与万物之间的共同性;而朱熹的解释更强调人与万物之间的区别。区别人与物,意在强调人比物尊贵;只有这些与自己一样尊贵的同胞,才是自己的兄弟。这正是朱熹“理一分殊”观点的具体表现。

人与物虽然不同,但也有相通之处。朱熹接着解释“物吾与也”,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:

物则得夫形气之偏,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,故与我不同类,而不若人之贵。然原其体性之所自,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尝不同也,故曰:“吾与”。则其视之也,亦如己之侪辈矣。

物由于在材料上的不同,没有生命和意识,因此与人非同类,更没有人类高贵。但是,从物

之所以为物的道理上看,它也是天理的产物,在这一点是与人类又是一样的。如果说,人与人之间由于材质相同,天性一致,因此是同血缘的兄弟的话,那么,人与物之间,由于天性有区别,所以是不同血缘关系的同代人。朱熹在此的本意是,强调爱护自然环境,如同爱护自己的同类一样。但是,朱熹却无意中将“吾与”亦即人与大自然的关系,解释为我与无血缘关系的同辈之间的关系。这种无意正是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过分强调血缘关系的结果。

张载将天地自然解释为一个大家族,然后又对人类社会进一步做家庭式的描述。他说:“大君者,吾父母宗子;其大臣,宗子之家相也。尊高年,所以长其长;慈孤弱,所以幼其幼。圣其合德,贤其秀也。凡天下疲癃残疾、茕独鳏寡,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。”<sup>④</sup>朱熹将这段话解释为:

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,则凡天下之人,皆天地之子矣。然继承天地,统理人物,则大君而已,故为父母之宗子;辅佐大君、纲纪众事,则大臣而已,故为宗子之家相。天下之老一也,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,乃所以长吾之长,天下之幼一也,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,乃所以幼吾之幼。圣人与天地合其德,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;贤者才德过于常人,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。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,则凡天下之疲癃残疾、孤独鳏寡,非吾兄弟无告者而何哉!<sup>⑤</sup>

朱熹首先强调,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地之子。这种强调表明了朱熹的平民意识。而他主张重建的家族,也不是周代的贵族宗法制,而是平民化的、普通百姓都有权利和能力建立的家族。不过,国家最高统治依然由“大君”完成,就像家族有宗子一样,天子就是上天的嫡长子。光有长子是不行的,还必须有诸位大臣的辅佐。那么,最高统治者禀承天地之意愿统理万民,具体做什么呢?朱熹把君主比做父母,把大臣比作优秀的兄弟。而治理国家就像管理家族一样,君主就像家族中的宗子,其责任就是敬老爱幼,救助自己受苦受难的兄弟。如此人性化的设想虽然是空想,却生动地表达了儒家传统的理想主义。

## 二、事天孝亲的家庭伦理

那么,如何才能使社会成为一个家庭呢?这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。张载说:“于时保之,子之翼也;乐且不忧,纯乎孝者也。”张载这里的“子”是指“宗子”,也就是家族中的领导人。宗子最大的希望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,能够高兴且无忧地做到这一点,就是对天地父母最纯粹的孝。对此朱熹的解释是:

畏天以自保者,犹其敬亲之至也;乐天而不忧者,犹其爱亲之纯也。<sup>⑥</sup>

朱熹比张载更强调天的权威性和人对天的敬畏感,同时将“保之”解释为为自保而对长辈的孝敬。关于“畏天”与“乐天”的区别,始于孟子。孟子说:

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,是故汤事葛,文王事昆夷。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,故大王事獯鬻,勾践事吴。以大事小者,乐天者也。以小事大者,畏天者也。乐天者保天下,畏天者保其国。

“以大事小”是说当自己的势力强大,却要服务于比自己弱小的对象。“以小事大”是说自己的力量弱小,不得不服从于比自己力量强大的对象。“以大事小”是一种道德境界,所以被称为“仁者”;“以小事大”,不得已而为之,是出于谋略,所以只能是“智者”。仁者可以得天下,智者只能保其国。朱熹在此套用孟子的观点,意在说明,“乐天而不忧”才是使“纯乎孝者”,是道德的最高境界。因为,这种道德完全出自对亲人的爱和主观的意愿,而不再是对上天的畏惧,因此,这样的孝心才是最纯粹的。

与这种“纯乎孝者”相反的就是不道德的行为。张载称其为“悖德”。张载说:

违曰悖德,害仁曰贼。济恶者不才,其践形,惟肖者也。

不敬亲、不爱亲者,就是“悖德”,没有仁爱之心而伤害生命,就是“贼”。帮人作恶的人不够做人的资格,身体力行实现天地父母意愿的人就是孝子。对这段话,朱熹以其成熟的理学思想,作了充分地发挥。他说:

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,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也,故谓之悖德;戕灭天理、自绝本根者,贼杀其亲,大逆无道也,故谓之贼;长恶不悛、不可教训者,世济其凶,增其恶名也,故谓之不才。若夫尽人之性,而有以充人之形,则与天地相似而不违矣,故谓之肖。

朱熹将“悖德”解释为受人欲支配的行为,这倒可以理解。为什么又解释为不爱自己的亲人,而爱他人呢?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爱的人,又怎么可能爱他人呢?显然,朱熹在此有所指,其对象就是佛教的“慈悲”和墨家的“兼爱”,二者的爱都不以血缘亲情为基础,这在朱熹看来,就是“悖德”。这是朱熹家族主义思想的必然结论。因为,重建家族的一个重要的依据,就是家族成员相互亲爱。如果大家都不爱亲人而爱他人,家族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。

那么,人们如何才能够做一名“践其性肖”的孝子呢?张载说“知化,则善述其事;穷神,则善继其志。”意思是,了解造化的力量,才能很好地解释自然;洞彻造化神秘,才能很好地秉承天地之性。张载此处的“知化”、“穷神”具有鲜明的认识论意义,朱熹虽然没有完全排除其认识论意义,但是却强化了其中的道德意义。朱熹说:

孝子,善继人之志、善述人之事者也。圣人知变化之道,则所行者无非天地之事矣;通神明之德,则所存者无非天地之心矣。此二者,皆乐天践形之事也。

孝子就是能够很好地继承父辈志向,完整陈述先人事迹的人。圣人掌握变化的规律,运用于实践就是行“天地之事”,所谓“天地之事”无非就是以仁爱之心,创造和维护生命;圣人与无形的力量相通,内心与“天地之心”达到一致,所谓“天地之心”就是大自然的主宰。这些构成“乐天践形”的全部内容。朱熹将孝子的道德行为,与天地自然规律联系在一起,从而使他重建家族的努力,表现为对自然与天地规律的遵循。

重建家族制度是一种人为的努力,完全凭借人们的自觉自愿似乎是不可能的。如同人们的道德行为,也不能完全凭借自律,必须借助神灵的力量。张载说“不愧屋漏,为无忝;存心养性,为匪懈。”朱熹解释说:

《孝经》引《诗》曰:“无忝尔所生。”故事天者仰不愧、俯不忤,则不忝乎天地矣。又曰:“夙夜匪懈。”故事天者存其心、养其性,则不懈乎事天矣。此二者,畏天之事,而君子所以求践夫形者也。

朱熹用《孝经》所引《诗经》中的话说明“敬天”与“乐天”之间境界的不同。“乐天”是人与天地一致而相通,“敬天”则将天地视为君临头顶的神明,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对象。必须做到无愧于天地。而且,神明一直临照着自己,所以存心养性的工夫不能有一丝一毫懈怠。这种神明在上的他律性,强化了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之间的张力,也增加了天理本身的强制性。这与建立家族制度以加大伦理规范的强制是一致的。

这样一来,就增加了理学所提倡的“存心养性”的修养方法的难度,为了证明这种修养方法的可行性,张载以几个历史人物为例,将他们树立为自己的榜样。他说“恶旨酒,崇伯子之顾养;育英才,颍封人之锡类。”说的是崇伯的儿子大禹,不贪美食,不饮美酒,一心为了更好地照顾和赡养自己的父母;守颖谷之地的颍考叔,一心只为教育优秀的人才。对此,朱熹解释说:

好饮酒而不顾父母之养者,不孝也。故遏人欲如禹之“恶旨酒”,则所以“顾天之养”者至矣。性者,万物之一源,非有我之得私也。故“育英才”如颍考叔之及庄公,则所以

“永锡尔类”者广矣。<sup>⑦</sup>

喜欢喝酒以至于不赡养父母,这种不孝的行为,在朱熹看来就是“人欲”,因此,他将大禹的“恶旨酒”解释为理学的“遏人欲”,那么,赡养父母解释为“顾天之养”,也就是“存天理”;又根据理学的“心性”之学的原理,将颡考叔育天下英才的行为,解释为“存心养性”的过程。

张载进一步又以舜等人为例来阐明自己的观点。他说:“不弛劳而砥豫,舜其功也;无所逃而待烹,申生其恭也。”意思是,坚持努力使父母欢悦,是舜的功劳;遵从父命,不逃而待烹戮,太子申生因此被谥为“恭”。朱熹解释说:

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豫,其功大矣。故事天者尽事天之道,而天心豫焉,则亦天之舜也。申生无所逃而待烹,其恭至矣。故事天者天寿不貳,而修身以俟之,则亦天之申生也。

朱熹将舜孝敬父母,最终化解父亲对自己仇恨的孝行说成是“事天”;申生宁可被烹,也不违背父命而逃亡,这种对父亲恭敬到极端的行为,被朱熹解释为孝敬父母和事天的孝子。在朱熹看来,死生已经注定而不可改变,这种静静等待命运降临的行为,也是一种修行。

可是,以死为代价的孝行岂不太过困难了?这对于普通人而言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,张载又强调,道德高尚的人结局也不一定是死,比如,“体其受而归全者,参乎!勇于从而顺令者,伯奇也”。曾参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,因为它受之父母,必须完整地还给父母;伯奇虽然受冤屈,却依然服从父命而接受放逐。对曾参和伯奇的所作所为,朱熹感慨道:

父母全而生之,子全而归之,若曾参之启手启足,则体其所受乎亲者而归其全也。况天之所以与我者,无一善之不备,亦全而生之也。故事天者,能体其所受于天者而全归之,则亦天之曾子矣。子于父母,东西南北,唯令之从,若伯奇之履霜中野,则勇于从而顺令也。况天之所以命我者,吉凶祸福,非有人欲之私。故事天者,能勇于从而顺受其正,则亦天之伯奇矣。

朱熹再一次将个人的命运交给上天,儿子服从父亲错误的命令,也成了对上天意志的服从。这种将孝道绝对化的理论,就是将父亲的权威与上天的权威,以及个人的命运混为一谈,以强化父权,为重建家族提供权威性的理论辩护。这种为专制制度辩护的理论与实践,只会奴化人性,是对儒家人本主义精神的反动。

### 三、人生意义与终极目标

儒家有着宿命论的传统,张载完全继承了这个传统,并且将人生的境遇解释为上天的赠予和磨炼自己的过程。张载说:“富贵福泽,将厚吾之生也;贫贱忧戚,庸玉女于成也。”对这句话,朱熹的解释是:

富贵福泽,所以大奉于我,而使吾之为善也轻;贫贱忧戚,所以拂乱于我,而使吾之为志也笃。天地之于人,父母之于子,其设心岂有异哉!故君子之事天也,以周公之富而不至于骄,以颜子之贫而不改其乐;其事亲也,爱之则喜而弗忘,恶之则惧而无怨。其心亦一而已矣。<sup>⑧</sup>

有了大富大贵这样的福泽,做善事就容易得多;如果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,就会受到困扰,这正可以锻炼意志,使志向更加坚定。大自然对于人类,就像父母对子女,没有任何私心。所以,面对自己的命运和境遇,即使像周公那样富有,也不能骄傲,即使像颜回那穷困,也不改为愉快的心情;在孝敬自己父母的时候,对父母的爱要牢记在心,父母憎恶自己,要感到畏惧却不能怨恨。无论父母喜欢还是憎恶自己,孝敬父母的心始终不变。

人为什么会如此无条件地孝敬父母呢?人为什么要选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呢?因为,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和终极关怀。张载说得很好:“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意思是,活着的时候,接受命运的安排;死亡来临时,安详地接受。心底如此平静、恬淡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是不可想象的。对这一点,朱熹更是大加赞赏和发挥。他说:

孝子之身存,则其事亲也,不违其志而已;没,则安而无所愧于亲也。仁人之身存,则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;没,则安而无所愧于天也。盖所谓朝闻夕死,吾得正而毙焉者。

朱熹再一次将张载的生死观与孝道联系起来,认为张载之所以“顺事”,是因为作为孝子事亲的时候,从来没有违背父母的意志,所以死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内心无愧。朱熹进一步解释“吾宁”,是因为达到了仁人的境界。所谓“仁人”就是尊重自然规律,不违背“天理”的人,所以,“仁人”死的时候自然无愧于天。朱熹最后将张载的生死观与孔子的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结合在一起,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。所谓“得正而毙”,就是应该死的时候,坦然面对死亡。朱熹与张载一样,将家族制度的重建与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联系起来,进一步强调了家族制度和宗观念中所包含的终极关怀的意义。

朱熹为张载《西铭》全文做完解释之后,在文章末尾进一步阐述“理一分殊”的观点。而这一观点,完全可以理解为重建家族的理论依据。朱熹说:

盖以乾为父,坤为母。有生之类,无物不然,所谓“理一”也。而人物之生,血脉之属,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,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?一统而万殊,则虽天下一家、中国一人,而不流于兼爱之蔽;万殊而一贯,则虽亲疏异情、贵贱异等,而不桡于为我之私。此《西铭》之大指也。<sup>⑨</sup>

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,都有生命的根源,这就是“理一”;可是,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父母,有自己的血缘和家族,因此人们会亲爱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,会爱自己所生的子女,这就是“分殊”。“理一”表示我们都有根源,“分殊”表示我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根源。“理一”表明我们必须孝敬父母,“分殊”意味着我们只能孝敬生养自己的父母。有了“理一”与“分殊”的区别,就使儒家孝亲之情区别于墨家“兼爱”,同时也使得重建家族这种私事,体现着上顺天意,下顺亲情的合乎“天理”的工作。这种感情本是家族之私,却与天下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相连,因此就不再是纯粹私人的问题。朱熹认为,这就是张载《西铭》的主要思想。其实,完全是朱熹自己创造性的发挥。尤其是最后一句:

观其推亲亲之厚,以大无我之公;因事亲之诚,以明事天之道,盖无适而非,所谓分立而推理一者。

家族内部血缘亲情,子女对父母的孝敬,这种道德情感可以扩展为服务国家、社会的公德。人们孝敬自己的父母往往出自于真诚的亲情,这种情感扩展开来,用以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,一定会达到目的。因为,孝亲与事天虽然对象不同,但是在道理上却完全一致,这就是“理一”。就这样,朱熹通过“理一分殊”的原理,既为自己重建家族的努力提供本体依据,同时又把重建家族的工作与对天理的认识和把握统一起来。最终在社会组织形式上,寻找经理学的生长点。是理学家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典型代表。

注释:

① 参见朱杰人:《西铭解·校点说明》,《朱子全书》第1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,第139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《朱子全书》第13册,第141、141、141-142、141-142、143、143-144、144-145、145-146页。